

读·党史

05
2024

总179期

五四运动

◆ 红色记忆 ◆ 薪火传承 ◆ 以史鉴今 ◆ 资政育人 ◆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主办

准印证号 (陕) 2024-DZ008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习近平关于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论述摘编》 出版发行



近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论述摘编》一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论述摘编》分10个专题，共计329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4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等13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省委党史研究室举办党纪学习教育读书班

5月7日至9日，省委党史研究室举办党纪学习教育读书班暨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纪学习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学习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室领导班子成员及8名处级领导干部重点交流研讨，全室党员干部参加。本次读书班采取专题辅导、集中学习、支部自学和分专题研讨相结合的方式，逐章逐条学习《条例》。邀请省直机关纪检监察工委有关负责同志以案说纪做专题辅导，全体处级干部提交了书面学习体会。



任惠林赴江山村调研产业帮扶工作

5月11日，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任惠林赴我室乡村振兴结对点——商洛市商州区腰市镇江山村，就贯彻落实乡村振兴安排部署、推进产业帮扶工作、加强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等问题实地调研。室机关党委、办公室负责同志参加。任惠林一行在听取情况介绍后，实地考察了江山民宿小院、蔬菜瓜果园的建设，参观了秦岭江山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围绕生态环境保护、红色资源挖掘、产业项目发展等方面与驻村工作队、村两委干部进行交流。



全省党史系统意识形态暨网络安全专题培训班在西安举办



5月23日至24日，全省党史系统意识形态暨网络安全专题培训班在西北大学举办。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丁仕显出席开班式并讲话，全省各地市党史部门意识形态及网络安全分管领导、业务骨干共计50人参加培训。本次培训班结合党史业务特点，设置了《舆情处置与媒体沟通》《坚持底线思维 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筑牢网络安全意识 防范网络安全风险》3场专题讲座和陕西广电融媒体中心、学习强国陕西学习平台、陕西省保密教育实训基地3场现场教学，通过理论解读、案例分析、形势介绍、现场观摩等多种形式，帮助参训学员树立网络安全意识，提升舆情应对能力，提高管网用网水平。

我室联合举办“红旗漫卷——纪念西安解放75周年主题图片展”

为纪念西安解放75周年，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推动广大干部群众学好党史、用好党史，我室与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举办了“红旗漫卷——纪念西安解放75周年主题图片展”。从5月13日起先后在省委，西安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等党政机关驻地，西安文理学院、西安育才中学、八十九中和省图书馆、钟鼓楼广场等点位巡回展出。图片展选取近120幅历史图片，分为“挺进关中”“解放西安”“保卫西安”三部分，展现第一野战军及人民群众解放西安、建立政权、保卫胜利果实的恢宏历史画卷。





经党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共陕西省委员会编写的《习仲勋年谱（1913—2002）》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习仲勋年谱（1913—2002）》共4卷，约110万字。这部编年体著作，全面记述习仲勋同志的生平业绩和思想，充分反映其崇高的品格风范。它的出版，对于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党的历史，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具有重要意义。

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 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习近平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上，全国各族青年听从党和人民的召唤，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社会服务、卫国戍边等各领域各方面勇当排头兵和生力军，展现出自信自强、刚健有为的精神风貌。党中央对广大青年充分信任、寄予厚望！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是五四运动105周年。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习近平指出，各级党组织要坚持党管青年工作原则，加强对青年工作的领导，关心青年成长，支持广大青年建功立业。共青团要肩负起新时代新征程党赋予的使命任务，传承弘扬优良传统，团结凝聚广大青年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

01

——《人民日报》2024年5月4日第1版



目录 CONTENTS



主 编：丁仕显
副 主 编：邓亚斌 苏 维
责任编辑：王 欢
封面设计：孙林曦
封面剪纸：谢爱萍

通讯地址：陕西省西安市
雁塔路南段10号
电 话：(029) 63907743
邮 编：710054
电子信箱：sxds9571@163.com
陕西党史网：http://sxdsw.org.cn/
印 刷：西安第一印刷厂
出刊日期：次月10日

赠阅范围

全省各级党史部门，省
级各相关部门，市县党政主要领
导，省内各高等院校、涉党史纪念场
馆、党史教育基地，省党史学会、党史人
物研究会，各省党史部门、各
省市党史期刊杂志社等



卷首语

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01

中省要求

习近平强调：不断开创新时代思政教育新局面

努力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

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04

学习宣传贯彻《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

毛泽东 05

推动全党全社会学好用好党史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务会理论学习中心组

10

党纪学习教育

习近平：党内法规制度是对全体党员的要求

15

党史上的纪律教育

吴美华 17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回望西安解放 铭记历史荣光

中共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

20

扶眉战役

中共宝鸡市委党史研究室

23

党史研究

五四运动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地位	范景鹏	26
党史上五四纪念的主要形式	韩雨	28
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	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	31

华山亮剑

警惕近年来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	吴克明	36
--------------------	-----	----

基地巡礼·马栏革命旧址

马栏革命旧址		41
马栏千人大礼堂	中共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45

市县动态

宣教动态		47
------	--	----

科研动态		48
------	--	----

《陕西党史》编委会

主任：任宗哲
副主任：梁月兰（女）
任惠林
丁仕显

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序）

王心 王利
王燕（女） 王宏兵
王晓林 仵红兵
刘伯雅 李伟
张蒙 张会亚
杨宏兰（女） 单舒平
岳宁（女） 赵鹏
赵晓亮 夏建刚
郭茂盛 曹全虎
韩晓晖

声明

1.来稿必须为原创作品，且未在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发布。请勿一稿多投，否则，不予采用。稿件自发出之日起三个月未见采用，可自行处理。

2.作者文责自负，凡作品因涉及侵犯他人权益而引发的纠纷，《陕西党史》概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

3.除作者另有注明外，《陕西党史》可根据需要对来稿进行文字性增删修改。个别转载文章和选用的国内外资料照片，敬请作者与我们联系，并领取稿酬。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陕西党史》所发文章均由作者授予使用权。投稿一经采用，即表明作者将该作品的出版权和网络传播权授予《陕西党史》。该著作权使用费与《陕西党史》稿酬一次性支付。如不同意，请在投稿时提前声明。



中省要求

04

习近平强调：不断开创新时代思政教育新局面 努力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 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坚持把学校思政课建设放在教育工作的重要位置，党对思政课建设的领导全面加强，各级各类学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更加鲜明，思政课教师乐教善教、潜心育人的信心底气更足，广大青少年学生“四个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奋发昂扬，思政课发展环境和整体生态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

■ 新时代新征程上，思政课建设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有新气象新作为。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构建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课程教材体系，深入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为内容支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要着力建设一支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思政课教师队伍

■ 各级党委（党组）要把思政课建设摆上重要议程，各级各类学校要自觉担起主体责任，不断开创新时代思政教育新局面，努力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

(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

□ 毛泽东

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当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从《六大以来》发出到现在，高级干部学习组、中央党校已经读了半年，别的单位现在也已经开始读。这是一件好事，今天已开始看到了好的结果。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现在来考虑我们过去所走的路和经验，要有系统地去考虑。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虽然在走每一步的时候也曾考虑过昨天是怎样走的，明天应该怎样走，但是整个党的历史却没有哪个人去考虑过。去年八九月中央经过讨论，印了《六大以来》这本书，在中央高级学习组里研究。我们怎样研究呢？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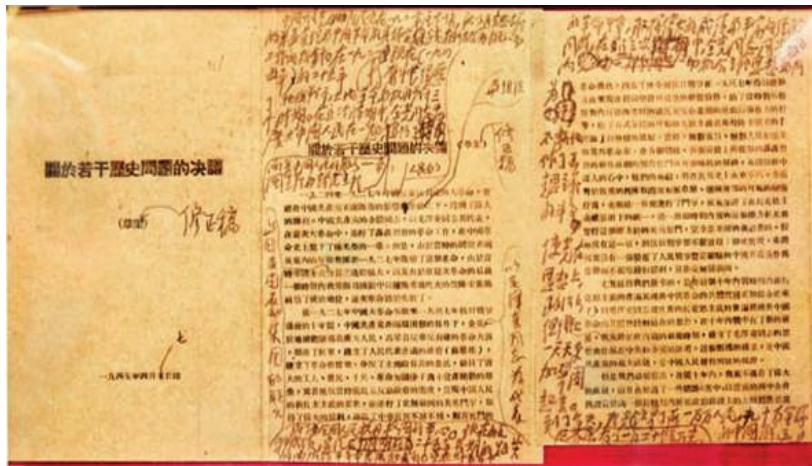
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我们要用这样的研究来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

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做“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段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

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我们党的历史，我觉得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大革命时期是第一个阶段；内战时期是第二个阶段；抗日时期是第三个阶段。这个分法是否妥当，大家可以讨论，我只是作为一个意见提出的，不是中央的决议。如果有更适合党的历史过程的分法更好。

革命的任务，三个阶段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第一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北洋军阀，第二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国民党，第三个阶段表现为反对日本侵略者及汪精卫汉奸。

* 本文是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结合全党学习《六大以来》具体情况在中央学习组作的一篇重要讲话。选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408页。



1945年4月20日，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党对中国民主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毛泽东同志领导起草这个决议，他先后多次修改，图为其中的一稿（部分）。

06

联合的群众，第一个阶段是全国各民主阶级，是国共合作；第二个阶段是缩小了的统一战线，国共分裂，全国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在国民党的领导下，一部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互相对垒，进行内战；第三个阶段是全民族抗日，恢复国共合作的形式。

革命所打击的目标，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北洋军阀，我们的政策是广泛的统一战线。第二个阶段表现为反对国民党，我们的政策是狭小的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下层小资产阶级联合。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的政策，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是我们的打击目标。革命的阵线是国共合作，全国各爱国力量。这是我们的路线。

第一个阶段内我们有正确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正确的地方是实现了国共合作，打击目标是对的，革命队伍的组织是对的。后来发生了陈独秀路线，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党的路线就不对了。当国民党准备实行叛变革命，要把无产阶级和农民丢了，要把我们和革命群众丢了的时候，我们还和它联合，这是右的机会主义。情况变化了，我们的政策路线没有跟着变。右的倾向是一切联合反对斗争。陈独秀路线的根本特点，便是一切联合反对斗争，就是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叛

变了的时候，还要同它联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策变了，而我们的政策不变。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打击革命了，我们的政策也还是不变。这就犯了右的错误。在联合中应该一方面与它联合，一方面与它斗争。第二个阶段中全国分为两个营垒。马日事变以后，有过一种盲动主义，说是“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接着的立三路线是在不应该全国暴动时要暴动。“九一八”到遵义会

议，当一个民族敌人打进来，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已经变化了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没有跟着变，还是过去的一套，这就发生了“左”的东西。那时的领导路线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

“九一八”以后情况变化了，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公开倾向我们，如孙科、黄炎培等。但是我们说他们是改良主义，说他们是我们主要的打击对象。把这些人当作主要的打击对象，是不对的。还有当时提出消灭富农，也是过左的。第三阶段既不是一切联合不要斗争，也不是一切斗争不要联合，而是联合与斗争的综合，联合是主，斗争是辅，要求统一下的独立性。统一就是联合，独立就是斗争。什么叫独立性呢？你站在这里，没有人叫你站开，这就不发生独立性的问题；在你站的位置上别人也想站，要赶你走，这就发生独立性的问题了。斗争、磨擦是为了统一，是统一的手段，这叫一打一拉，又打又拉，有理、有利、有节。在不妨碍统一下的独立自主，也就是希望团结得更好。

中共党史分成这三个阶段，就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党的政治路线讲，都合乎事实，都说得通。

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大革命之前，还有一个准备阶段。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是大革命的

直接准备，可以和一九二五年开始的大革命合成一个阶段。“七七”以前，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国共合作的局面大体上已经形成，这可以考虑合并于第三个阶段，也不必再分。

说到革命的准备，一九二一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特别是五四运动，大革命的思想、干部、群众、青年知识分子都是这时开始准备的。所以严格地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这前面的部分扯远了嫌太长，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

辛亥革命发生在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觉醒，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全世界无产阶级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还没有实际革命行动，只是准备革命的时候；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还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的时候。而五四运动是发生在欧洲大战、十月革命之后，这时的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已不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而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后备军了。五四运动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响应，所以比辛亥革命更深刻。辛亥革命只是在政治上推翻了清朝皇帝，没有彻底。我们写历史时常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其实并不能说完全失败，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但后来失败了，没有巩固它的胜利，封建势力代替了革命，袁世凯代替了孙中山。那时无产阶级没有以一个觉悟的阶级走上政治舞台。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发生的。十月革命对世界的觉醒，对中国的觉醒，影响是很大的。五四运动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有了觉悟，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是广泛的统一战线，内部有左翼、右翼和中间势力。在“五四”

以后一个月发生了六三运动，全国罢工、罢课、罢市。那时的罢工还是无产阶级自发的运动。我们应该把五四运动中工人态度研究一下。那时罢工虽然没有共产党领导，但其中总有领头的人。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国民党没有在五四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它是站在旁边的。

五四运动准备了大革命，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是产生在“五四”之后，五四运动又是产生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的号召之下组织起来的，是共产国际派人来帮助组织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国际代表到会。

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现在有很多东西直接联系到那时候，比如反对党八股，如果不联系“五四”时反对老八股、老教条、孔夫子的教条、文言文，恐怕就不能把问题弄清楚。

对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估价，需要研究。辛亥革命是完全失败呢，还是有些胜利？五四运动是有群众，还是没有群众？我认为五四运动是有广大的群众性的，比起大革命来自然是差些。那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统一战线，还没有农民参加，只有广大的工人。到大革命，就有农民参加了。土地革命时，参加的农民就广泛多了，但是统一战线不够广。到抗战，农民参加得更广泛了，比大革命时广，比土地革命时也广，同时有了比过去更广大的统一战线。

五四运动是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带着自发的性质。但是这种自发性和以前

的不同，它多少有些觉醒，许多人赞成十月革命，赞成列宁的革命。孙中山曾说，列宁是革命的圣人，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他是作为同盟者来赞成共产主义的。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当时的人们有一个很大的觉醒。五四运动发展到共产党的成立，工人运动向前发展了，这才有了后来的国共合作。所以不说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于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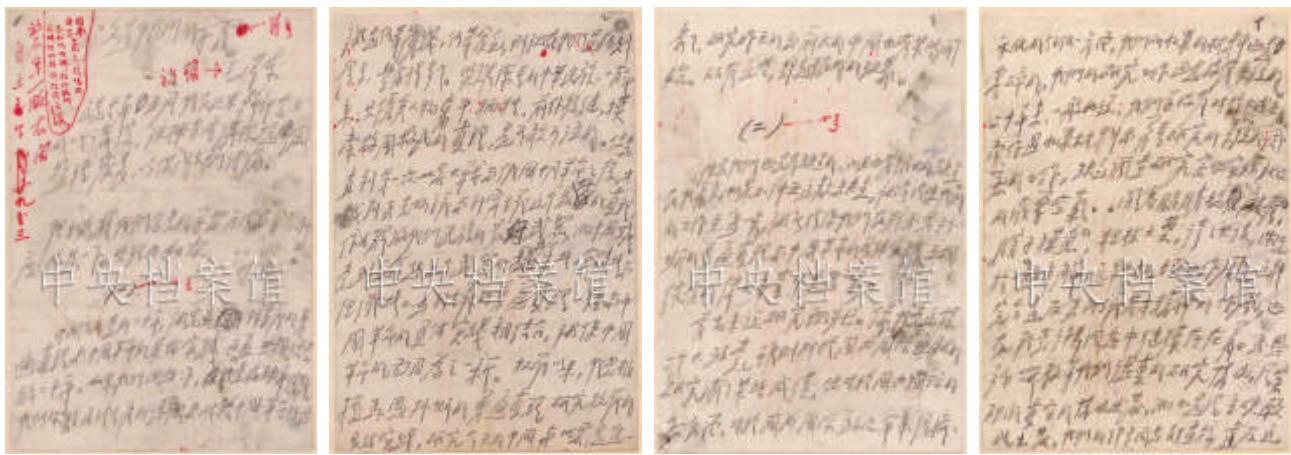
在说到辛亥革命时，如不说到当时国内国际的情形，就不能说明革命的发生。同样，不说明“五四”时代的政府是什么政府，也不能说明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的发生。所以当时的重要政治文件，像宣统皇帝退位的诏书，袁世凯、段祺瑞政府的一些文件，孙中山的几个重要宣言等，都要研究。

08

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这时期的斗争对象，是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北洋军阀。如果不说明那时候地主怎样压迫农民，资本家怎样压迫工人，帝国主义怎样分裂中国，北洋军阀怎样对付革命，那就很难了解当时的斗争。要研究当时的国共合作，如果只看共产党的宣言而不看国民党的宣言还不够。共产党员那时是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的，国民党是一个大团体，如果不把这个大团体搞清楚，就不能了解当时的情形和后来陈独秀犯错误的要不得。关于“四一二”、马日事变的材料也要看。内战时，我们反对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如不讲国民党如何投降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同国民党一起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就看不到内战的必要。如果我们不知道主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土地和牛这些东西是在谁的手里，不把地主与农民对土地的所有关系搞清楚，就不会知道土地革命的必要。如果不把国民党在“九一八”以后还是继续打共产党不去打日本这些情形讲一讲，我们反对国民党就显得没有道

理、没有根据。抗战是国共合作大家抗日，国民党发表了许多文件，共产党也发表了许多文件。国民党的抗日文件有些是好的，但是它又要反共。我们自己的文件要看，国民党的文件也要看。国民党的好的文件要看，反共的文件也要看。如果不看这些材料，就不了解反对国民党反共的根据。因为他们先发表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些东西，闹磨擦，我们在不妨害团结、不致引起分裂的条件下强调斗争是有必要的，如果不强调斗争，那就会又来一个陈独秀主义。

谈到中国的反帝斗争，就要讲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凶恶地侵略中国。讲到中国无产阶级，就要讲到世界无产阶级，讲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斗争，就要讲到马、恩、列、斯他们怎样领导国际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这就叫“中外法”。中国是“中”，外国是“外”。借用这个意思，也可以说，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五四运动是“中”，段祺瑞、曹汝霖是“外”；北伐是“中”，北洋军阀是“外”；内战时期，共产党是“中”，国民党是“外”。如果不把“外”弄清楚，对于“中”也就不容易弄清楚。世界上没有这方面，也就没有那方面。所以有一个“古今”，还有一个“中外”。辛亥革命以来，五四运动、大革命、内战、抗战，这是“古今”。中国的共产党、国民党，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和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等，这就是“中外”。我想，为了有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将来需要编两种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后编排。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我们研究党史，必须全面看，这样研究党史，才是科学的。我们研究党史，必须是科学的，不是



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指出：“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图为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改造我们的学习》（部分）。

主观主义。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只看客观原因够不够呢？不够的，还必须看到领导者的作用，那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错误，都是有客观原因的，找到客观原因才能解释。

现在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在研究历史时也应该注意历史上有没有这些东西。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才能学得一种科学的方法。这种科学的方法不是主观主义，不是宗派主义，也不是党八股。我们要应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我们党在各个时期的策略路线，研究各个个别的问题，如军事问题、肃反问题、农民土地问题等。

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国那边去就不是研究中共党史了。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

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如果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发展，党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研究就不会有结果。我们读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它告诉我们，布尔什维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创造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布尔什维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前没有过，这是列宁所领导的党在俄国创造的。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用这个理论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斯大林接着又搞了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比如说，我们党在大炮没有、飞机毫无的条件下创造了八路军、新四军，这就是中国自己搞出来的。

推动全党全社会学好用好党史

□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务会理论学习中心组

目前，党中央印发《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党章为根本依据，对党史学习教育的领导体制和工作职责、内容、主要形式、保障和监督等作出全面规范，是新时代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的基本遵循。

《条例》的制定和实施，对于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推动全党全社会学好党史、用好党史，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具有重要意义。

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史学习教育，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明确了“为什么学党史”“党史学什么”“怎样学党史”“学党史要达到什么目的”等重要问题，为制定出台《条例》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条例》贯穿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为什么学党史”的重要论述。“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习近平总书记经常提起的这几句话，道出了“为什么学党史”的道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忠实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

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的“百科全书”，即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我们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真学习党的历史，全面宣传党的历史，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强调学习党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要求我们从党的百年奋斗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总结历史、把握规律、坚定信心、走向未来。

《条例》贯穿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什么”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阐述“党史学什么”的问题，明确了党史学习教育的着力点。他指出，学习党史，就是要从这部伟大历史中受到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理想信念的生动教育，就是要“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指引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强调要进一步感悟思想伟力、增强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的政治自觉，进一步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进一步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的认识、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本色，进一步总结党的历史经

验、不断提高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水平，进一步发扬革命精神、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昂扬精神，进一步增强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强调要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把党走过的光辉历程总结好，把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总结好，把党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宝贵经验总结好，把党的创新理论和实践创造总结好。强调让正确党史观更深入、更广泛地树立起来，让正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

《条例》贯穿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怎样学党史”的重要论述。党史学习教育必须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从政治上总结党的历史，对党百年奋斗的伟大历程和重大成就，要从我们党以历史主动精神创造历史的政治高度进行概括。强调要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实事求是看待党史上的重大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的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强调党的历史就是我们党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的历史。如何认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是社会历史观的重大问题。学习党史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党史学习教育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要发扬马克思主义优良学风，坚持分类指导，明确学习要求、学习任务，推进内容、形式、方法的创新，不断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让红色基

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

《条例》贯穿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党史要达到什么目的”的重要论述。学党史的目的概括起来讲就是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史明理，就是要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道理，深刻领悟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的真理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学史增信，就是要增强对马克思主



枣园革命旧址五大书记铜像

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使之成为我们战胜一切强敌、克服一切困难、夺取一切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学史崇德，就是要传承红色基因，涵养高尚的道德品质，崇尚对党忠诚的大德、为民造福的公德、严于律己的品德，始终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忠于党、忠于人民、无私奉献。学史力行，就是要坚持在锤炼党性上力行、在为民服务上力行、在推动发展上力行，以史为镜、以史明志，在乱云飞渡中把牢正确方向，在风险挑战面前砥砺胆识，激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信心和动力，风雨无阻，

坚毅前行，开创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伟业。

牢牢把握党史学习教育的主要内容，全面系统学习党史

党中央在印发《条例》的通知中强调，要把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和党史基本内容、党的历史结论、党的历史经验、伟大建党精神贯通起来，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党史观。用好党的历史这部教科书，必须按照《条例》要求，把握好党史学习教育的主要内容，全面系统学习党史。

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一百多年来，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条例》坚持学党史和悟思想相统一，把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摆在党史学习教育的首要位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要全面系统掌握这一思想的基本观点、科学体系，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促进工作的强大力量。

学习党的历史结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党中央曾三次郑重地对党的历史作出科学总结，形成了三个历史决议，即：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三个历史决议对史上的重大问题作出科学结论，对于推动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具有重大意义。《条例》强调，认真学习党的三个历史决议，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和指示要求，理解和把握党中央关于党史的最新表述、评价和结论，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学习党史基本内容。我们党已经走过一百多年的历史。在百余年接续奋斗中，党团结带领人民开辟了伟大道路，建立了伟大功业，铸就了伟大精神，积累了宝贵经验，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进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迹。党的百余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条例》要求，全面系统学习党史，学习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学习党的不懈奋斗史、不怕牺牲史、理论探索史、为民造福史、自身建设史。“四个时期历史”和“五个方面历史”，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构成了党史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内容。要通过全面系统学习党史基本内容，深刻认识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认识和把握党对中国人民、中华民族、马克思主义、人类进步事业、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学习党的历史经验。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注重从历史中寻经验、求规律、启智慧。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了“九个必须”的宝贵经验。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深刻总结了党百年奋斗“十个坚持”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都是我们党在历经艰辛、饱经风雨的长期摸索中积累下来的，是前进道路上克敌制胜的法宝。《条例》强调，学习和运用党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这对于正确判断形势、科学预见未来、把握历史主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学习伟大建党精神。革命理想高于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一百多年前，我们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一百多年来，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党的伟大精神，深深融入我们党、国家、民族、人民的血脉之中，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条例》将伟大建党精神纳入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强调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精神力量。

树立正确党史观。以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待党的历史，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如果历史观错误，那么不仅达不到学习教育的目的，反倒会南辕北辙、走入误区。《条例》把“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作为党史学习教育工作遵循的原则之一，并将“树立正确党史观”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树立正确党史观，要认真学习党史

基本著作和权威读本，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坚决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自觉与丑化党和国家形象、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抹黑英雄模范、歪曲党的历史等言行作斗争。

坚定历史自信，把握历史主动，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在新的赶考之路上，能否继续交出优异答卷，关键在于有没有坚定的历史自信。对历史进程的认识越全面，对历史规律的把握越深刻，党的历史智慧越丰富，对前途的掌握就越主动。我们要以《条例》的制定和实施为契机，更好用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增长智慧、增进团结、增加信心、增强斗志，坚守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不断加强理论武装。思想就是力量。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思想指引。理论兴则党兴，思想强则党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行动指南，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我们要通过党史学习教育，深切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在新征程上更好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始终牢记初心使命。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们党一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这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回顾党的历史，党始终将初心融入血脉，把使命扛在肩上，

紧紧依靠人民，在腥风血雨中一次次绝境重生，在攻坚克难中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我们要通过党史学习教育，把牢记初心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作为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

大力发扬传统作风。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要得到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就必须持之以恒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并坚持了一整套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我们要通过党史学习教育，鼓舞和激励广大党员做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人，赓续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奋勇争先、建功立业。

科学把握历史规律。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理解历史才能走得远。历史发展有其规

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有科学把握历史规律，按历史规律办事，才能无往而不胜。我们要通过党史学习教育，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进一步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站在历史的深厚基础上更加坚定走向未来。

《条例》的制定和实施，是党的建设的一件大事。要抓好《条例》贯彻落实，进一步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2024年5月11日第5版）



南泥湾党徽广场

习近平：党内法规制度是对全体党员的要求

近日，《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选编（2017—2022）》出版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坚持依规治党，注重发挥党内法规在管党治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中的重要作用，全方位、立体式推进建章立制工作，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建立了十分严格的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充分释放出党内法规的强大治理效能，充分彰显出依规治党的强大政治保障功能。一起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部分相关重要论述。

党内法规制度是对全体党员的要求

15

按党章等党内法规办，按党确定的干部标准办，按党的纪律办，是天经地义的事，不存在对干部进行苛求的问题。对干部要求严一点，是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改进作风、管理队伍的基本着眼点。我们要把正确的做法坚持下去，不能放松尺度。

——2014年3月9日，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在我们国家，法律是对全体公民的要求，党内法规制度是对全体党员的要求，而且很多地方比法律的要求更严格。我们党是先锋队，对党员的要求应该更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努力形成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制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局。

——2014年10月20日，习近平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作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要发挥好党内法规在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保障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方面的重大作用，在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方面的重大作用，确保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2021年12月，习近平对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

坚持依规治党、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要按照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部署，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快补齐党建方面的法规制度短板，力争到建党100周年时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2016年12月，习近平对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依规治党、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明确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经过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革命性锻造，我们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构建起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营造了尊崇制度、遵守制度的良好氛围，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独特优势。

——2022年1月18日，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讲话

坚持执规必严、使党内法规真正落地

要加强对党章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等党内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首要任务，落实到纪律建设、监督执纪、巡视巡察、责任追究各个环节，维护党章党规党纪的严肃性。

——2018年1月11日，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制定和修订了140多部中央党内法规，出台了一批标志性、关键性、基础性的法规制度，有规可依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下一步的重点是执规必严，使党内法规真正落地。绝大多数落马官员忏悔时都说自己不懂党纪国法。为什么党内这么多高级干部走上犯罪的道路？根本原因在于理想信念动摇了，但对党纪国法没有敬畏之心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2018年8月24日，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坚持制度上全贯通，把制度建设要求体现到全面从严治党全过程、各方面、各层级，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用制度促进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贯通、联动，真正实现制度治党、依规治党。

——2023年1月9日，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

党史上的纪律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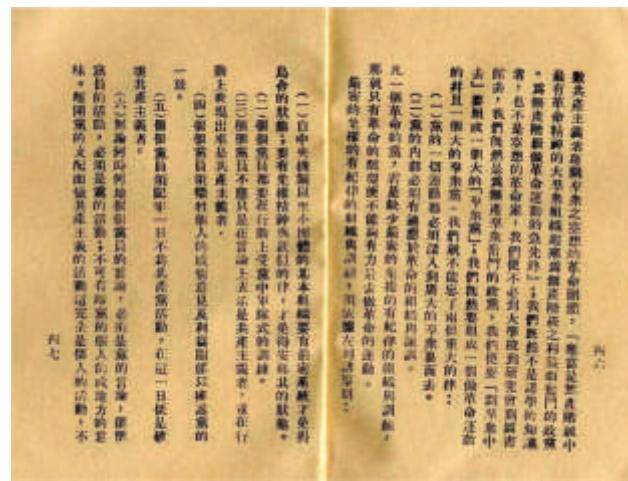
□ 吴美华

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在重要历史节点，高度重视并适时开展对全党的纪律教育，积累了丰富经验，保证了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回顾党史上的纪律教育，能够使我们以史为鉴，更好地弘扬纪律强党的优良传统，传承严明纪律的红色基因。

建党伊始，纪律就被视为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条件。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虽然没有使用纪律的概念，但是包含了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的相关内容。党的二大制定的第一部正式党章，专设“纪律”一章，规定了极为严格的纪律。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明确提出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强调我们的组织与训练必须是很严密的、有纪律的。党的五大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政治纪律”的概念，指出：“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五大党章，第一次载入“民主集中制”，第一次规定选举产生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强调“严格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及全体党部最初的最重要的义务”。这些关于纪律的规定成为党员教育的重要内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武装斗争成为党的中心工作。红军素

以纪律严明著称，一贯重视纪律教育。当时，抓军纪就是抓党纪。毛泽东在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过程中，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并郑重宣布了三大纪律；不久，针对部队攻克县城后侵占小商贩利益等问题，他又宣布了六项注意。不到一年后，通过完善发展形成了最初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35年，这些纪律条文被改编成歌曲，广为传唱，成为我党我军纪律教育的生动教材。1947年10月，毛泽东对原先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的条文作了统一规定并重新颁布，在纪律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7



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

延安时期是我们党逐步走向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抓住3个事件进行全党范围的纪律教育，强化广大党员干部的纪律观念。

一是反对张国焘分裂活动进行“四个服从”

教育。张国焘作为党的重要领导人，长征途中自恃军事力量强大另立中央，大搞分裂活动，到达陕北后仍不思悔改，只身逃离陕甘宁边区叛党而去。针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行径和吸取的教训，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四个服从”的原则，后正式载入七大党章，成为最基本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一直沿用至今。

二是通过黄克功事件进行严明纪法教育。黄克功16岁就参加革命，参加过长征，到达陕北后任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1937年10月，他因逼婚不成激愤之下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当时在延安有两种声音：一种是杀了黄克功，杀人必须偿命；一种是赦免黄克功，因为他资格老、功劳大。毛泽东在给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黄克功案件审判长雷经天的复信中严肃指出，黄克功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果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要求“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黄克功事件在边区引起极大震撼，共产党不仅以纪法严明取信于民，而且以在纪法面前人人平等昭示全党。

三是针对处分刘力功进行组织纪律教育。刘力功是一个从国统区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1938年入党，先在抗大学习，后去中央党校培训，毕业后不服从组织安排。党组织曾7次找他谈话，但仍拒绝执行党组织让他去基层工作的决定。为此，中央党务委员会决定开除刘力功的党籍，并公布于全党。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专门撰写了《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上发表。围绕这个问题，延安各机关、学校开展了一场广泛

的大讨论，极大提高了党员、干部、学生遵守纪律的自觉性。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伟大的解放战争进程中，纪律成为能否夺取全国政权的关键因素。这一时期的纪律教育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吸取高家堡事件教训，加强党的政策和纪律教育。1948年1月，时任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的习仲勋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反映了我军攻克陕北榆林高家堡时，对商人乱没收等破坏纪律的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上批语：“高家堡破坏纪律的行为，应追究责任，并向全军施行政策教育与纪律教育”。以此为契机，全党开展了大抓纪律的工作。

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强调“加强纪律性”。由于各根据地、各部队长期远离中央，一度存在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现象，导致各种违纪问题时有发生。为此，中共中央先后出台一系列文件，包括《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等，从而形成了正规的请示报告制度，保证了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特别是1948年9月8日至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立了规矩，着重强调了加强纪律性问题。会后向全党全军发布了著名的四句话口号：“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全党全军遵守纪律的自觉性极大提高，这为最后的战略决战、夺取全国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党在全国执政地位的确立，一些违纪腐化问题开始滋生蔓延，党内违反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的行为有所抬头，党的纪律建设处于更加复杂的内外环境，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以共和国第一反腐大案为开端，拉开了执政党纪律教育的大幕。1951年11月，查处了刘青

山在担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在担任天津行署专员期间的严重腐败问题。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法院在当时的省会保定召开公审大会，以贪污罪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以高饶事件为突破口，严肃党的政治纪律，维护全党的团结统一。1953年，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高岗与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搞非组织活动，破坏了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撤销高岗、饶漱石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出党。会议还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相比，其地位更高、权限更大，更有利于加强对全体党员特别是对党的高级干部的监督。对高饶事件的处理给全党敲响了警钟，使全党进一步认识到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党的政治纪律是不可触犯的高压线，任何时候都必须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针对“文化大革命”及其结束后不正之风逐步蔓延的状况，部署严厉打击各种违纪违法行为，进行全面整党，纯洁党的组织，整肃党的纪律，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同时针对此前党规党纪遭到严重破坏的状况，着力建立健全党内法规。十二大党章明确规定：“共产党员必须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

“坚决维护党的纪律，是党的每个组织的重要责任。”这部党章还对纪律处分的原则、种类、程序，对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领导体制、地位作用、职责任务、工作权限等作出明确规定，从而以党的根本大法的形式，为新时期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简洁、准确、规范的文字作出12条规

定，对于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政治纪律、正确处理党内各种关系，发挥了长久深远的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把纪律建设纳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突显了纪律建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纪律教育的力度持续加大，纪律教育的水平不断提高，纪律教育的效果更加显著。新时代的纪律教育有两大特点。

一是把纪律教育渗透融汇于各种主题教育之中。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部署开展6次党内集中教育，包括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每一次主题教育都包含了纪律的内容，使得学纪、知纪、明纪、守纪成为广大党员的自觉行动。

二是以党内纪律法规作为纪律教育的重点。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有关纪律方面的党内法规更加健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作为基础性主干性党内法规，在党的纪律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以1997年的试行条例、2003年的正式条例为基础，于2015年、2018年、2023年连续3次修订条例。新修订的条例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纪律建设的理论创新、实践经验、制度规矩进行总结、融合和升华，是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集大成之规”。此外，以党章为总源头和总依据，以《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基本遵循，新立或修订了一系列相关党内法规。这不仅对于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于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产生了积极影响。

（来源：《学习时报》2024年4月12日第5版）

编者按：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深入贯彻落实《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进一步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推动全党全社会学好党史、用好党史。我们从本期开设“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专栏，依次推送各地市解放纪实，全面回顾陕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全域解放的光辉历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汲取精神力量、坚守初心使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回望西安解放 铭记历史荣光

□ 中共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

20

5月20日，对于西安这座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城市而言是个不平凡的日子。75年前，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西安人民，为争取自由和解放，为保护城市免遭破坏，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1949年5月20日在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下，古城西安获得解放。中国共产党人用舍生忘死的无私精神、英勇无畏的革命气概，一举解放了西安城，千年古都浴火重生，西安人民迎来了盼望已久的新生与光明。

黎明前夕

1949年4月19日至23日，第一野战军前敌委员会在澄城县平城召开第六次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习仲勋作总结讲话，要求抓紧时间进行军事训练，筹备粮草，准备吃大苦，打大仗，解放西安，解放大西北。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5月11日，第一野战军侦察部队，侦查胡宗

南有可能放弃西安，撤退汉中迹象。同时，中共西安情报处和中共西安市工委也分别向中央、关中地委和第一野战军报送了胡宗南部将要撤离的情报。鉴于形势紧急，第一野战军决定发起陕中战役，并制定了作战计划，剑指西安。

5月13日，第一野战军第二军侦察支队一举攻占高陵县城，把胡宗南设置在渭北的弧形防线撕开一道缺口，为解放军横渡渭河、解放西安创造了条件。在解放军准备进军西安的强大威慑下，5月18日，胡宗南、国民党陕西省主席董钊等仓皇乘飞机离开西安飞往汉中。国民党反动政府组织了有1000多名成员的“火焰别动队”，炸毁西京电厂、大华纱厂的动力锅炉，打砸公共设施，在西安全城实行戒严，突击捕人、杀人。

解放西安

5月19日，第一野战军第六军各师先后到达咸阳集结，准备强渡渭河。国民党胡宗南部在渭河南岸构筑防御工事；为了阻止解放军过河，炸毁了渭河咸阳大桥，破坏了所有的渡船，给解放

军渡河造成很大困难。在实地查看渭河岸边地形后，第六军领导对全军渡河作战进行了全面部署。当晚，渡河部队找来当地艄公做向导，潜水探察水深和渡河路线。

5月20日拂晓，在密集的火力掩护下，第六军全线强渡渭河成功，全歼南岸守敌，随即向西安推进。第十七师四十九团在三桥与敌人遭遇交火，敌军败逃。四十九团进攻西安西门，占领西门后，继续向城内搜索前进。第四十八团在第四十六团配合下占领了飞机场。第四十六团从南门攻入。第十七师第五十团攻下三桥火车站后，在铁路工人帮助下，乘火车向西安进发，迅速占领了西安火车站，夺下了北门。随后，攻入西安的第四十六团、第四十九团和第五十团在钟鼓楼会合。解放军在钟楼、电厂、工厂等地缴获了大量炸药，挫败了敌人破坏城市设施的阴谋。到14时，第六军已完全控制了西安城。

解放周边区县

第六军解放西安后，即以一部追击逃往城南秦岭山区的敌第十七军残部，另一部占领西安北郊草滩镇。

5月20日下午，第十六师四十八团接管了设在长安王曲的国民党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在小峪口收编了长安县保安团，长安解放。

21日，担任解放西安侧翼侦察任务的第六军两个侦察连接管户县大王镇的武装；在中共户县工委和游击队配合下侦察连进入县城，户县解放。

21日，解放军渭北纵队二支队进入临潼县城，临潼解放。

25日，第十六师四十八团进驻蓝田县城，国民党蓝田县自卫团起义，蓝田和平解放。

30日，第一野战军第二军第六师进驻周至县城，周至和平解放。至此，西安全境解放。

在解放西安战斗中，解放军俘虏国民党官兵1274人，缴获各类枪支1973支、火炮51门、弹药17.4万余发，以及大量物资。

欢庆胜利

人民解放军进入西安后，模范地执行党的城市政策，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人民群众秋毫无犯，用实际行动戳破了国民党特务散布的各种谣言，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得到了民主人士的好评。

5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军举行入城仪式，第四十六团、第四十七团、第四十九团、第五十团和第六军直属队指战员在西安南门外集合，组成三路纵队，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雄纠纠、气昂昂从南门循序而入，然后转向东门。数十万西安市民涌上街头，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热烈欢迎人民子弟兵。火车站及各条大街均张贴出“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解放军是人民的大救星”等巨幅标语。整个古城在激荡，人民在沸腾，在火红的五月，古城人民用各种方式欢庆城市的新生与解放。

5月24日，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并发出布告，宣布对西安全市实行军事管制。西安市军管会连续发布命令，对国民党遗留下的政权机关、官僚资本，公共事业及军事单位等实施接收接管。

6月12日，在革命公园召开近10万人参加的庆祝西安解放暨欢迎人民解放军大会。军管会主任贺龙、副主任赵寿山，军管会副主任、市委书记兼市长贾拓夫、市委副书记赵伯平等出席大会。当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指战员进入会场时，会场上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锣鼓喧天，万臂齐挥，高呼口号欢迎人民解放军。

重大历史意义

西安解放，是党中央把握形势，科学决

策，坚强领导的重大胜利。解放西安作为陕中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外围战斗后，入城相对顺利。回顾历史不难发现，西安的顺利解放，蕴含着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未雨绸缪、运筹全局的战略智慧和第一野战军顺势而为、应势而谋的主动灵活。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第一野战军第六军广大指战员，周密部署，众志成城，强渡渭河后向西安推进，势如破竹，不到一天的时间，就顺利解放了西安城，成功挫败了国民党破坏活动，保护了古城基础设施，保障了人民生活的安康。

西安解放，是各级党组织坚强领导，密切配合，通力协作的重大胜利。为配合西安解放，1948年12月中共西安市工作委员会成立后，努力发展党、团组织；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国民党西安市政府民众自卫总队起义；向解放西安的部队提供政治、军事、经济情报；开展护厂、护校等一系列斗争，从而加快了解放西安的进程。西安解放后，中共西安市委、西安市人民政府及各区人民政府、临时区委成立后，立即带领人民群众积极恢复生产，医治战争创伤；发展生产，支援前线；肃特清匪，维护社会秩序；禁毒禁赌、取缔娼妓，清除社会毒瘤；平抑物价、稳定金融，保障群众生活。正是有各级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才为解放西安、接管西安、发展西安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西安解放，是全市人民衷心拥护，全力支持，军民鱼水情深的重大胜利。面对国民党政府在西安实行的法西斯统治，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英勇的西安人民前仆后继，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多次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民主运动。西安人民满腔热忱，盼望着共产党、解放军早日到来。在解放西安的过程中，铁路工人及时向我军报告城内敌人的动向，并

让部队乘火车攻占西安火车站及北门。西安地下党还组织群众欢迎解放军入城，进行后勤支援，有力地支持了解放西安的战斗。很多工厂的工人组织了护厂队，将工厂大门封锁起来，将敌人的爆破队拒之门外。西安市人民政府成立后，第六军立即主动将缴获敌人的一切物资、汽车等全部移交了过去，帮助政府克服了很大困难，受到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赞扬。贺龙十分满意地说：“六军不仅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部队，而且是一支非常遵守纪律的部队。”许多学生、教师、市民主动送来慰问信、慰问品，深切表达了对解放军的爱戴之情。

西安解放，为整个大西北的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西安地区成为支援解放大西北的后方基地。西安解放后，仍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胡宗南部，纠集盘踞在甘肃、青海、宁夏一带的马步芳、马鸿逵部11个师，向咸阳、西安反扑。1949年6月，西安市成立了支前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市的支援前线工作。解放后数月内，西安各区积极动员车辆，组织民工，转运物资和伤员，全市有6万多名劳动妇女参加缝制军袜、军被、军服工作。正是因为立足西安，1949年7月，人民解放军一举歼灭国民党军胡宗南部4.4万余人，取得了扶眉战役的全面胜利，彻底改变了西北战场形势，进而为解放大西北、进军大西南创造了条件。

西安的解放不仅使人民获得了新生，也使这座古老而文明的城市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铭记历史，砥砺前行。今年，西安将持续深化“三个年”活动，加快实现“八个新突破”，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干事业、开新局、创未来，创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西安实践取得新气象、新作为，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中勇当先行示范。

扶眉战役

□ 中共宝鸡市委党史研究室

1949年7月10日至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下，在西北人民的大力支持下，进行了关系西北战争进程的大决战——扶眉战役。扶眉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西北战场上国共双方投入兵力最多、歼敌最多、战果最辉煌的重要战役，彻底粉碎了胡马联盟，解决了长期制约西北战场的瓶颈问题，同时铺平了进军西北、西南的通道，为解放大西北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起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24日，太原解放。胡宗南估计华北将有大部队西调，慑于被歼，自25日起命所属部队向西南方向撤退，企图与马步芳、马鸿逵部配合，以陕中、陇东为防御重点，阻止解放军西进。第一野战军获悉胡宗南集团有放弃西安、全部撤至汉中，并可能经川入滇的企图后，抓住有利时机，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发起陕中战役，对全线西撤的胡宗南部实施追击，于5月20日解放西安，6月中旬在咸阳重创胡马集团，胡马部队被迫西撤转入防御。

陕中战役后，胡宗南将5个军猬集在武功、扶风、眉县地区的渭河两岸，控制了西安以南土地岭至宝鸡一线的秦岭北麓诸高地。“二马”则分散驻扎在东起旬邑县土桥镇，西至麟游县崔木镇，南至永寿，北到长武、彬县一带。胡、马在渭河之滨的狭长地带布成了一个“口袋阵”，企图凭借有利地形，联合作战，阻止第一野战军西

进和南下。

—

7月初，调归第一野战军指挥的十八、十九兵团和中原军区第十九军以及参加太原战役的第一野战军第七军全部进入陕西，集结完毕。第一野战军的兵力由原来的15万人增加到35万人，连同西北军区等地方部队，总兵力达到40万人，改变了西北战场长期以来敌多我少的状况。

7月6日，第一野战军前委在咸阳召开第七次扩大会议，彭德怀在会上提出了经中央军委同意的“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方案。彭德怀指出，一野兵力虽占绝对优势，但宁青“二马”未曾遭到歼灭性打击，战斗力较强，且兵力分散，不易围歼，而胡宗南在扶眉地区兵力集中，秦岭以南又没有可以北援的预备队，利于聚歼。另外，胡宗南5个军分布在渭河两岸，没有大军渡河设施，被攻击时南北无法相互支援。而“二马”在进犯咸阳时损失严重，不会轻易援胡。会议决定先打胡宗南集团，迫使胡部退往汉中，孤立“二马”，待扶眉战役完成后，主力迅速西进，歼灭青宁“二马”。7日，第一野战军发出《关于歼灭胡宗南、王治岐军于漆水河千阳间及眉县地区的作战部署》和《奋勇前进，全歼胡马匪军动员令》，要求各兵团务必于8日前完成战斗准备。

7月10日，扶眉战役开始。第十九兵团在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的率领下，进至乾县、礼泉及其以北高地，构筑工事，向“二马”援陕

军团摆出进攻姿态，保证主攻部队右翼安全。第十八兵团六十一军向西安以南的子午镇国民党军发起攻击，歼其第十七军十二师和第六十九军八十四师千余人，残部南逃。

11日拂晓，第一野战军发起进攻。第二兵团由礼泉出发，西渡漆水河，从胡、马两集团之间自北向南楔入，直插国民党第十八兵团侧后。16时，第四军十二师夺取乾县临平镇，掩护主力挺进。担任兵团前卫师的第四军十师，由临平北出发，经扶风县天度镇，绕过法门寺镇，强行军150里，连夜进至岐山县青化镇。12日凌晨，第四军十一师主力占领益店镇后进入罗局镇，同十师并肩阻击妄图西逃之敌。3时，十师占领罗局镇。7时，二十九团二营南下20里攻占眉县车站，消灭了国民党第十八兵团警卫营，截断了国民党军西逃之路。与此同时，第十八兵团在周士第司令员指挥下，由咸阳、兴平沿咸凤公路、陇海铁路向西推进，在攻克武功后，占领了扶风杏林镇和绛帐镇，迫使正面的国民党军步步后退。第一兵团在王震司令员的指挥下，兵分两路，沿渭河南岸的长益公路及秦岭北麓向西挺进，歼灭国民党第九十军、第三十六军大部后，攻克周至、眉县，在渭河南岸警戒，策应北岸行动。至此，第一野战军完成了对扶风、眉县地区国民党军第十八兵团一部和第三十八军、第六十五军、第一一九军的战略包围。

国民党前线总指挥、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见防线不断被撕破，遂下令向岐山罗局镇退守。12日拂晓，被包围的国民党第六十五军、第三十八军开始全力向西突围。坚守在罗局的第四军第十、十一师在“寸土不失”“堵住敌人就是胜利”的口号鼓舞下，英勇御敌，打退了国民党军十余次集团冲锋，使其未能前进一步。第四军与突围的国民党军苦战时，第三军、第六军相继攻克扶风县城、午井镇、高王寺诸要点，从青化镇东西线向罗局镇地区国民党军的侧后发起攻击，迫使国民党第一一九军残部

向西南突围，搅乱了对方防线，国民党军自相践踏，全线动摇。到12日中午，国民党3个军被压缩在了高王寺以南、陇海铁路以北、罗局以东、午井以西的狭窄地段。

15时，第一野战军向国民党军发起总攻。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第二兵团第三军、第四军、第六军同第十八兵团的第六十军、第六十一军、第六十二军及第七军，从东、西、北三面向国民党军队猛攻。国民党部队步步退缩，逃至渭河后，向南泅渡。时渭河暴涨，3000余人被淹死。侥幸过河者，被埋伏在南岸的第一兵团俘虏。20时，第二兵团与第十八兵团在罗局、午井地区胜利会师，随后西进，连夜解放岐山。

13日，第一野战军主力继续向西挺进。14日零时，第二兵团第四军十二师攻占蟠龙山，随即控制了蟠龙山和陵塬两个制高点。凌晨3时，第四军十二师攻入市区，占领宝鸡。与此同时，第一兵团第二军占领宝鸡以南的益门镇。14日晨，第二兵团第三军攻克凤翔。守卫宝鸡的国民党军第二一四师炸毁渭河大桥后向秦岭以南的汉中逃跑，被从渭河南岸赶来的一兵团围歼。国民党宝鸡警备司令徐经济、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杜德霖、宝鸡县长杨培森，宝鸡县自卫团团长秦伯瀛、副团长李伯恭及该团官兵，仓皇逃到宝鸡县西部的凤阁岭等地。马步芳、马鸿逵见大势已去，便沿西兰公路后撤甘肃平凉、张家川一带。西北军事重镇宝鸡宣告解放，扶眉战役胜利结束。

扶眉战役共歼敌4.4万余人，缴获各种火炮290余门，机枪1160挺、长短枪9000余支，各种子弹60余万发，汽车6辆，骡马2400匹，电台26部，报话机7部、电话136部，望远镜72副，其他军用物资若干。收复与解放了武功、眉县、扶风、岐山、凤翔、永寿、麟游、宝鸡、千阳等九座县城，使西府大地彻底获得了解放和新生。扶眉战役胜利后，毛泽东致电祝贺：“歼胡四个军甚慰。”

三

扶眉战役的胜利，彻底结束了国民党胡宗南集团在西北长达十二年的反动统治，从根本上扭转了西北战场敌强我弱的被动局面，为最终歼灭“二马”集团和解放大西北打开了战略通道，其军事作用和政治意义都非常重大。

军事上，首先，扶眉战役以解放军4000余人的伤亡，消灭了国民党部队1个兵团部、4个军部、8个整师另3个整团的有生力量，沉重打击了敌人，国民党西北部队再也没阻挡解放军西进之力。其次，扶眉战役的胜利，使退守汉中的胡宗南集团失去了北线屏障，切断了胡、马集团的联系，彻底粉碎了其反共军事联盟，打破了他们败退四川、南逃云贵，继而逃往台湾的企图。再次，扶眉战役的胜利，使解放军占领了通往西南和西北的咽喉要地——宝鸡，为解放大西北和大西南打开了通道。

政治上，扶眉战役的胜利解放了关中广大地区，彻底结束了胡宗南在西北地区的长期反动统治，使之成为支援人民解放军的重要战略基地和物资补给基地，加快了西北乃至全国解放战争胜

利的步伐。据统计，仅宝鸡解放后的3个多月，宝鸡地区就支援部队粮食4967.9万斤，送军鞋近30万双，出动大小车1.6万辆，担架5500多副，动员组织支前民工12.4万人，保证了解放军的作战需要。

75年前，扶眉战役中广大解放军将士以坚定的信念、钢铁般的纪律和不畏牺牲的革命精神，深刻诠释了什么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充分彰显了共产党人的精神气质。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既是为了缅怀先烈，知道来时的路，更是为了传承未来，坚定新长征路上的正确方向。新征程上，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铭记和珍视扶眉战役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伟大精神，永远铭记和珍视人民群众用担架和小车推出来的美好生活，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深入实施“一四五十”战略和

“三个年”活动为统揽，扎实推进“十项重点任务”，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加快建设副中心、全力打造先行区，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贡献宝鸡力量。



扶眉战役烈士纪念碑

五四运动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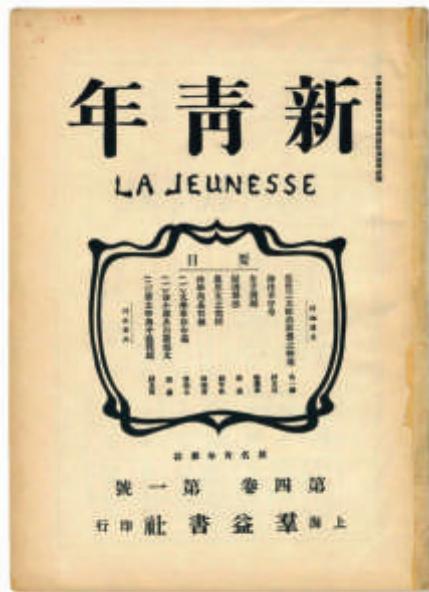
□ 范景鹏

1942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指导学习研究中共党史时明确指出，我们研究党史，只从1921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这前面的部分扯远了嫌太长，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思想、干部、阶级条件都是在五四运动期间奠定的。

26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思想条件，肇始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广泛传播的五四时期。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成为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各种新思想大举输入和引进，各种主义竞相争艳，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拉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在五四运动发生的前一年李大钊就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指出俄国十月革命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同年还写有《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热烈赞扬十月革命，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

五四运动刚爆发时，李大钊分两期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这一时期，《新青年》《每周评论》《民国日报》等一批报刊纷纷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据统计，五四运动时期在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多达



《新青年》杂志

200多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译文，这样集中地介绍一种思想理论，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是罕见的。五四运动前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发展成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运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干部条件，肇始于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大量涌现的五四时期。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长期饱受帝国主义欺侮而又在反帝斗争中屡遭失败的中国人民增强了斗争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心。一批激进民主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逐渐放弃了过去信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转变成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五四运动的总司



1919年7月《湘江评论》创刊号第一版版面一角

令”陈独秀经历了这一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1919年12月，他在《告北京劳动界》中指出：18世纪的民主，是资产阶级向封建主义作斗争的旗帜；20世纪的民主，乃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旗帜。五四前后，毛泽东两次到北京，热心阅读关于十月革命的书籍和马克思主义著作。他主编的《湘江评论》在五四运动后，热情歌颂俄国十月革命。五四期间，周恩来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和《觉悟》，并发起成立觉悟社，介绍和研究新思潮。1920年11月，前往欧洲留学，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地考察和对各种学说的比较和选择，也开始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同一时期，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董必武、林祖涵、吴玉章等一批先进分子，以及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李达、邓中夏、赵世炎、向警予、王尽美、邓恩铭等进步青年，结合辛亥革命的失败和五四运动的经历，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及

“与劳工为伍”的实践，在思想感情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逐步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阶级条件，肇始于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五四时期。中国无产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因而“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的坚决和彻底”；中国无产阶级从破产农民出身的占多数，和农民及其他劳动群众存在天然联系，使得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成为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便于发动和组织其他劳动群众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五四运动前后正酝酿着先进力量的更换，中国工人阶级以巨大的声势参加了反帝爱国斗争，在运动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对斗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民众的力量得到了广泛的发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体现出人民群众在民族复兴斗争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无产阶级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从而使中国革命的性质开始发生重大的转变，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同社会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能够为人民认识真理指明方向和开辟前进的道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和改造社会的武器加以接受的，他们一旦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以此为指导，积极投身到群众中去，深入工厂、矿山、铁路、农村等地进行社会调查，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筹备成立工人组织。注意同实际结合，同群众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一开始就具有的特点和优点。“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相结合，必然会产生无产阶级的政党。

（作者为中共甘肃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

党的历史上五四纪念的主要形式

□ 韩雨

五四运动，是在先进青年知识分子领导下、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百余年来，党一直高度重视五四运动，多次举行不同形式的纪念，以传承五四精神，引领青年运动的方向。这些纪念大致可归纳为文本纪念、大会纪念和活动纪念三种形式。

文本纪念：弘扬五四精神的主要载体

28

文本纪念，形式灵活、丰富多彩，可谓纪念五四最广泛的形式。

社论，特别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刊，如《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红旗》的社论，代表着

党的声音，具有高度的时代性和指导性。1942年、1945年、1946年5月，《解放日报》先后刊登纪念五四的社论，号召打破教条主义，解放思想；加强对解放区乃至全国青年运动的领导；打击国民党的进攻，为民主、自由而斗争。从1949年开始至今，每当“逢五”“逢十”五四纪念日，《人民日报》都会刊发社论，结合时代特征，提出青年运动的方向，如《发扬光荣传统建设伟大祖国》（1959年），《让五四精神在新时代放射新的光芒》（2019年）等。

在报刊上开辟专栏、特刊或专号，发表新闻报道、论文、回忆和歌曲，是五四纪念的另一种重要形式。1920年5月4日，《晨报》专出“五四

纪念增刊”，次年同日又在二、三、六版登载蔡元培、李大钊等人的近20篇纪念文章。20世纪20年代，恽代英、张太雷、瞿秋白等党的早期领导人，也曾在《中国青年》《向导》等党内刊物发表纪念文章。1939年，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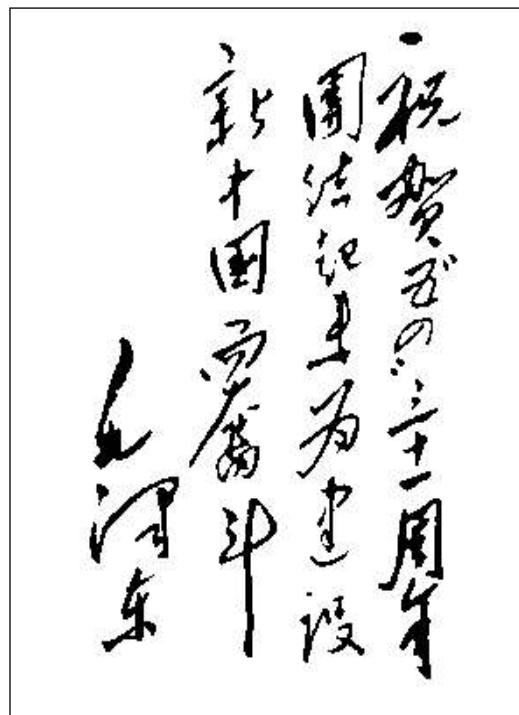


2019年4月30日，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值五四运动20周年，可以说是党以文本形式大规模纪念五四的元年。《新中华报》《解放》《群众》《新华日报》《中国青年》先后登载毛泽东、博古、邓颖超等的纪念文章。

发表通告、指示或通电，传达党对五四纪念的安排，也是一种文本纪念的形式。1924年4月，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党员，以学生为中心，广泛演说，弘扬五四精神。此后，中央经常发出通告、指示或通电，要求各地在5月4日前后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

在出版图书方面，早在1919年6月，上海公义社就曾出版图书，开以图书形式纪念五四的先河。1949年，党领导下的新华书店在上海发行《“五四”卅周年纪念专辑》，收录毛泽东、吴玉章、范文澜、叶圣陶等人的40篇讲话、回忆和论文。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出版社等集中出版一批关于五四运动的书籍，如《五四运动回忆录》《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五四运动在北京》等。



1950年，毛泽东为《北大周刊》题词：祝贺“五四”三十周年 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题词也是纪念五四的一种文本形式。1950年，《北大周刊》准备出版五四专号，5月，毛泽东特地题词：“祝贺‘五四’三十周年，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另外，还有发行邮票、纪念章，办图片展等补充形式。从1947年东北解放区发行最早的一套五四纪念邮票，到新中国成立后相继发行纪念五四运动的专题邮票，方寸之间传承了五四青年不屈向上的精神。

大会纪念：动员青年群众的庄严仪式

大会纪念，因程序严格、形式庄重，而形成一种强大的“感染域”和“情绪场”。人们置身其中，就会经历一场精神洗礼。早在1920年、1921年，北京学生、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就先后召开五四纪念大会。但受限于危急的革命形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举行大会无法成为常态化的纪念形式，大会的规模也不大。直到1939年，党在陕甘宁拥有一块比较稳定、巩固的根据地，才第一次举行高规格的纪念大会。5月4日下午6时，在延安抗大五大队操场，来自中央党校、马列学院等单位的万余名青年欢聚在一起，举行五四20周年纪念大会。会议开始后，首先鸣炮升旗，全体肃立，继而选出毛泽东等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接着，毛泽东发表讲演，宣布把5月4日定为中国青年节，号召广大青年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此后，召集大会成为一种惯常而有效的五四纪念形式。

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纪念大会具备更便利的条件，特别是在“逢五”“逢十”周年时，党中央都会召开规模宏大的五四纪念大会。同时，借助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迅速向全国、全世界传递出党和国家的时代最强音。这种大会，庄严、肃穆，仪式感强，能够很好地唤醒和延续五四记忆，传播爱国主义主流价值。

进入新时代，按照党中央的相关要求，关于

五四的大会纪念，日益制度化、规范化。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与时代主题、社会发展同频共振，成为五四纪念的突出功能。2019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对新时代中国青年提出“树立远大理想、热爱伟大祖国、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练就过硬本领、锤炼品德修为”等6点要求，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托，不辜负我们这个伟大时代。

活动纪念：丰富多彩的精神传承形式

30

活动纪念，主要是举办演讲会、报告会、音乐会、游行示威、表彰会、联欢会、文艺晚会、诗歌朗诵会、体育运动会等，丰富青年的精神生活，传承五四精神，达到纪念的目的。

早在1919年10月，李大钊就在《国民》杂志社成立周年纪念会上演讲，盛赞五四运动“排斥侵略主义”“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可谓以演讲形式纪念五四的发端。1939年5月4日晚，延安青年围着篝火，露天表演秧歌舞、生产舞、大合唱，纪念五四。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纪念五四的形式日益丰富。1950年5月4日，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四青年节，在国歌和世界民主青年进行曲的乐曲声中，首都9万男女青年高举着“保卫世界和平”“建设新中国”等标语，举行盛大游行活动。同一天，北京大学布置的“毛主席在校工作室和李大钊同志纪念室”揭幕，原样陈设毛泽东和李大钊在该校工作时的办公桌、书籍、文章等。



1950年5月4日，首都青年庆祝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四青年节。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后，活动纪念呈现出多元化、广泛性、时代性等特征。1984年5月，为进一步调动广大青年学习知识的积极性，铁路总工会等部门组织20万人，进行“铁路知识百题竞赛”，并举行发奖大会。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举办系列纪念五四活动，历时两个月之久。

从1997年开始，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表现突出、作出重大贡献的先进青年，颁发“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至2024年，该项奖励已评选28届，授予黄文秀、朱婷等各行业、各民族的1000多名优秀青年。

从2006年开始，每年5月4日，香港都在金紫荆广场举行隆重的升旗仪式，纪念五四运动，以激发香港青少年的民族自豪感，培养他们的爱国热情和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

五四纪念的形式在变，但五四精神的内核未变；时代主题在变，但阐释五四历史、激励青年群众献身祖国的目标未变。在五四运动105周年来临之际，挖掘纪念资源，弘扬五四精神，可以很好地激励广大青年牢固树立爱国主义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来源：《学习时报》2024年5月3日第5版）

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

□ 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

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于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举行，历时11个月。会议对建党以后特别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段党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结论，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全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一致，标志着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在思想上作好了充分准备，是中共中央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次中央全会。今年是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八十周年，本文对这一历史事件脉络进行了梳理回顾。

1944年5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书记处会议。会议对召开六届七中全会作出决定：（一）全会于5月21日召开。（二）议事日程：（1）推举主席团。向全会提议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2）由毛泽东报告：七大的议事日程及开会方式；七中全会期间一切日常工作由主席团办理，原政治局及书记处停止开会；最近国共谈判问题。（3）由任弼时通知召集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各种问题起草委员会、七大代表的资格审查以及会议中的秘密注意事项。会议还决定：委托任弼时、李富春、彭真审慎提出中央直属机关补选代表的名单，交由中央直属党委召集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

选举之；增补博古参加党的历史问题报告准备委员会，萧克参加军事问题报告准备委员会^①。

5月21日下午1时，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5月19日中央书记处确定的关于召开党的七大的各项议案，提交六届七中全会决定。毛泽东通报了5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内容。召开党的七大终于实实在在地提上了议事日程。

一、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1944年5月21日下午2时至8时，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第七次全体会议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六届七中全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为党的七大的召开作全面准备。这次会议，原准备开两个月，接着就召开七大预备会和七大，后因国共谈判、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美军观察组及赫尔利来延斡旋国共和谈等原因，断断续续开了11个月，至1945年4月20日结束。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长的一次会议。

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首先由七大筹委会秘书长任弼时宣布全会正式开幕。接着，任弼时向全会通报了召开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通报参会人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中央委员共24人。其中因病请假者4人：王稼祥、关向应、王明、凯丰。因公外出者3人：林

31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63页。

伯渠、董必武、陈潭秋。到会者17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康生、彭德怀、张闻天、陈云、博古、邓发、李富春、李维汉、陈郁、吴玉章、杨尚昆、孔原。均有表决权。另一种是，七中全会带有扩大性质。12名各中央局、分局及其他方面的重要负责人：彭真、高岗、贺龙、林彪、叶剑英、陈毅、刘伯承、聂荣臻、朱瑞、徐向前、谭政、张金保（女），也有发言权与表决权^②。王首道和胡乔木担任这次会议记录。

在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会议的两项任务，即准备七大和在全会期间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了简单的中央工作报告。毛泽东主要回顾了自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确定的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入我国国土的情况下，中共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方针的执行情况，以及关于七大议程准备的一些变化情况。

会议表决通过下列议案：

（一）七中全会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

（二）七中全会主席团的任务是准备七大及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全会期间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中央各部委仍照常工作。

（三）同意毛泽东代表政治局提出的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六项意见。1.党内党外问题。在去年党的路线学习中，有部分同志怀疑王明、博古同志是党外问题，现在确定是党内问题。2.合法与非法问题。过去有同志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现在查到临时中央有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五中全会也经过共产国际批准，所以是

合法的，但选举手续不完备。四中全会是合法的，但政治路线的内容是不好的。3.思想弄清与结论宽大问题。自整风以来，我们的方针就是“治病救人”。我们要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责任。因此，组织结论可作宽大些。现在要宣传解释这个方针，使同志们了解实行这个方针的必要。思想要弄清，结论要宽大，对党才有利。对抗战时期的问题也许不在七大上作结论，七大只作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的结论。4.不要反对一切。对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也不要否定一切。当时我和博古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分歧点就是如何打蒋介石，就是策略上的分歧。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定，就是一种偏向。5.对六大的估计。六大基本上是正确的。6.党内宗派问题。经过遵义会议和六中全会，党内没有宗派了，现在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山头主义。

（四）七大议事日程及报告负责人为：政治报告—毛泽东；组织及党章报告——刘少奇；军事报告——朱德；党的历史问题报告——任弼时；统一战线报告及公开演讲——周恩来。还拟安排关于陕甘宁边区（高岗）、华北（彭德怀）、华中（陈毅）三个地区工作的讲演。同意增补朱瑞（时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参加统一战线报告准备委员会。

（五）批准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③

二、六届七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1944年6月5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中心议题是城市工作问题。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是否把夺取大城市作为一个战略

②王健英：《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历届中央领导集体述评》（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768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63—464页。

任务，提上议事日程，并就此展开热烈讨论。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康生、周恩来、彭德怀、聂荣臻、彭真、朱瑞、洛甫、朱德等也先后发言。会议讨论和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并决定将《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交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修改后发出。会议决定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彭真、刘少奇、康生、陈云、刘晓等14人组成城市工作委员会，彭真为主任，并建议七大的议程增加城市工作一项。

三、六届七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1944年11月9日晚，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听取毛泽东报告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美国前陆军部部长赫尔利少将会谈情况。

四、六届七中全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1944年12月7日晚7时，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会议听取当日从重庆飞回延安的周恩来、董必武关于国共谈判情况的报告。会议认为国民党既已拒绝“五条协定”，而所提三条明显地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因此，已无法求得双方提案的基本共同点。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董必武再去重庆谈判已无必要。会议还决定：由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发起，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准备委员会党内由周恩来、林伯渠、高岗、薄一波、丁玲等14人，党外由李鼎铭、柳湜、续范亭、马阿訇等21人共同组成。

五、六届七中全会第五次全体会议

1944年12月9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举行第五次全体会议。会议再次讨论关于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问题。会议决定准备委员会名额为30人，

并通过《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发起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书》、通电及党内指示三个文件。毛泽东指出：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目的是组织沦陷区，加强解放区，帮助大后方，促进联合政府。

六、六届七中全会第六次全体会议

1945年2月18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举行第六次全体会议。会议听取了周恩来关于同国民党谈判情况及美国对华政策及其内部在对日战略问题上的不同主张。

3月16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召开会议。会议决定：

关于七大准备工作

(一)一切于25号前准备好召开七大的一切准备工作，准备要在26号能正式开会。

(二)拟向七中全会提出下列同志为七大主席团：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康生、高岗、陈毅、陈云、林老（林伯渠）、（任）弼时、董老（董必武）、彭真、洛甫（张闻天）、徐向前、贺龙。主席团设五人常委以便处理日常事务，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

(三)可以于原则上可多吸收各地代表参加。

(四)大会开幕典礼及正式会议议程批准如下：

(开幕礼)

1.致开幕词—毛泽东；

2.推举大会主席团及正副秘书长；

3.通过大会议程；

4.演说朱德、林老（林伯渠）、周恩来、冈野进；

5.推举代表资格审查及政治、军事、党章、历史等委员会。^④

^④1945年3月16日，任弼时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记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62页。

大会正式议程为：

- (1) 毛泽东作政治报告。
- (2) 朱德作军事问题报告；然后进行大会发言。重要发言有：周恩来报告统战问题，彭德怀报告华北情况，陈毅报告华中情况，高岗报告陕甘宁情况。
- (3) 党章问题报告及讨论。报告人：刘少奇。
- (4) 党的历史问题报告及讨论。报告人：任弼时。
- (5) 通过各种问题决议及通电。
- (6) 选举中央委员会。^⑤

七、六届七中全会第七次全体会议

1945年3月3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举行第七次全体会议。会议议题主要是讨论为七大准备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草案和党章草案。

34

毛泽东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主要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毛泽东主要阐述了论联合政府要联合的对象及纲领。

第二部分，毛泽东主要阐述了集中力量解决抗战建国的任务及设想联合政府的三种可能性。一种是坏的我们不希望的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是以蒋介石为首的独裁政府；第三种可能性，是以我们为中心联合政府。这个问题不在报告上写。^⑥

朱德发言：这个政治报告（草案）是二十几年中国革命经验的结晶，比《新民主主义论》更发展了，是整个解决中国问题的纲领。

刘少奇就修改党章的经过及有关问题作了说明，指出：“党章照顾了现在和将来，一方肯定

了严肃性，一方允许了灵活性。”“总纲是党的基本纲领，作为党章的前提与组成部分，可以更加促进党内的一致。以毛泽东思想来贯穿党章，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党章强调了保证党与广大群众联系的群众路线，加强和扩大党内民主，也就是党内的群众路线，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党员有在一定的会议上可以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的权利。这一条我动摇了几回，

‘任何’两字写了又圈掉，圈了又写上。六中全会时我写的党规党法是强调纪律的。当时新党员居绝大多数，现在这些党员都有五六年以上的党龄了。所以我虽然动摇了几次但仍倾向于给党员这个权利。这样虽会出一些乱子，但没有这一条，乱子会更多。”经过讨论，大家同意新党章写上这一条，但将“在一定的会议上”改为“在党的会议上”。

会议经过讨论，一致通过毛泽东准备在七次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和刘少奇准备提交七次大会讨论的党章（草案）。

这次会议，对七大的议程作了一项重要更动，即将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报告改为由七中全会讨论形成决议，七大的报告及有关大会发言和讨论中不再涉及历史问题。会议决定：“为着使七大集中力量讨论当前的政治、军事、组织问题，决定在取得各代表团的同意之后，准备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提交七中全会的下次会议讨论和通过。”

八、六届七中全会第八次全体会议

1945年4月20日，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76页。

⑥《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1945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277页。

会议议程：

- 1.会议讨论朱德为七大准备的军事报告。
- 2.会议基本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3.会议通过七中全会主席团提出的七大的议程（政治报告、军事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和选举中央委员会）、七大主席团及常务主席、秘书长（正任弼时、副李富春）和以彭真为主主任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大会议事规则等。

在讨论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时，任弼时首先代表七中全会主席团作了说明：“（一）决议主要是讲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党的历史若干重大问题。抗日战争时期的问题留至以后解决。（二）解决历史问题的方针是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分析错误的内容与根源，而不着重个人的责任。（三）第二次草案与第一次草案的主要区别是确定王明的小册子与四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起点，第三次草案是把第一、二次的八点改了一下，把毛主席的思想从正面加以强调说明。（四）各代表团对第三次草案还有些意见，准备再修改时考虑采纳。（五）王明写的声明，也对决议草案表示拥护，我们欢迎他的这个态度，希望他在以后行动中加以实现，不断进步。”

毛泽东说：《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同全国人民有关联的，对全党与全民负责的。哪些政策或者其中的哪些部分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就对今后的斗争有利益，对今后党和人民有利益。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族或职业团

体，党员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因为政见相同结合起来的。政见不同就要有争论，争论时要分清界限。凡是政治上过去犯过错误现在改正了的同志，我们都要团结他们，全党要像《决议》所说的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的错误缺点没有挂上，不是我没有而是没有挂，为了党的利益没有写上。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还是会逾矩的。^⑦

《决议》总结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同时，全面详尽地阐述了历次“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并着重分析了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在总结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经验时，强调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

《决议》提出：全党今后的任务，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进一步统一了全党思想，增强了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巩固团结，为七大的顺利召开创造了充分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条件。

^⑦《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3—284页。

警惕近年来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

□ 吴克明

历史虚无主义在我国思想文化界特别是毛泽东研究领域不时泛起，一些人借口“重新评判”历史，用种种所谓“历史细节”“还原历史本貌”等来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造成了部分人的思想混乱，在社会上引发了不良后果。搞懂弄清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与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危害以及历史虚无主义的应对措施，对当前正本清源、以史为鉴意义重大。

36

一、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与特征

(一) 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否定历史规律和价值、解构整体历史观的思想体系

历史虚无主义往往基于一定价值预设而采用所谓历史“细节”来污化、丑化、虚化或神化现实政权代表性人物的合法性和现行制度的合理性，以达到其否定现存政治格局的价值目的，一般分为理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与实践上的历史虚无主义，且二者之间具有内在一致性。从政治文化视角看，历史虚无主义既是一种“虚无主义”，“虚化”历史的规律性和进步性，抽掉人类发展的历史运行目标和追求的价值支柱，又虚无“历史”本身，往往避而不谈历史观的根本问题，陷入局部的、片段的、琐碎的所谓“历史事实”，将矛头直指现实政治的合法性。因而，历史虚无主义常常是文化精神虚无主义，它通过否定一个民族、国家、军队的英雄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意义及其当代价值，否定孕育其中的

文化及其内在精神，进而摧毁其历史文化精神的家园，使这一民族、国家与军队丧失自尊和自信乃至失去凝聚力、向心力与软实力，进而使之趋于分崩离析和弱化解体。

(二) 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历史规律性和整体历史观，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形而上学历史观

历史虚无主义在内容和方法上，不是一般地否定民族历史和文化精神，而是否定某一阶段或某几阶段的历史，同时以主观随意的所谓“历史选择论”为指导，以无根据的“细节”假设为前提，不对历史事实判断进行全面深入了解，就把现象当本质，根据历史现象的表象进行主观臆想，推断历史发展的可能结局，得出所谓“新发现”“新解读”“新结论”，且往往把支流变成主流、以偏概全，随意放大一些历史事实，以达到否定现实、整体再造的价值预设。在思维模式、表达方式和传播途径上，历史虚无主义动辄全盘否定，要“断裂”，非此即彼，形而上学猖獗，且常常以学术研究的面貌出现，显示其观点是科学研究、理性思考的产物，是展示学术研究、观念创新的结果，或利用书报、电视、电影和网络等途径，影响社会舆情，诱导人们“全新认识”和科学判定某段历史或某个历史人物。所以，历史虚无主义反映的是文化问题、精神问题，更是现实的政治问题；既是对历史的态度问题、立场问题，更是对现实的态度和立场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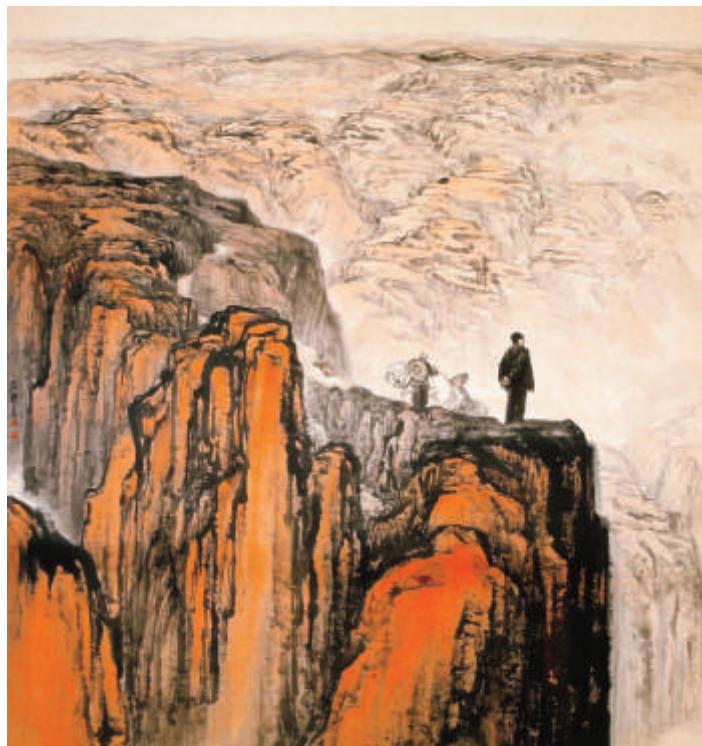
二、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危害

邓小平认为：“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多次反对对他本人的一些不适当不科学的评价，经常教育我们正确理解人民与领导人或领袖的关系。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他建议：“除了做好毛泽东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释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然而，对毛泽东及其思想这样重大的政治问题，近年的研究中引发了种种虚化、污化甚至妖魔化毛泽东的历史虚无主义现象，有学者称之为“非毛化”思潮。在历史虚无主义者的“研究”中，毛泽东的“罪过”是一个重要领域。他们出于其特定的旨趣——从历史维度来证明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和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是“背离了近代文明的主流”，着力发掘一些关于“大跃进”

“人民公社”“总路线”“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史料”，得出毛泽东塑造“个人崇拜”、热衷“暴力革命”、建立“集权政治”以及“为个人恩怨发动‘文化大革命’”等结论，导致毛泽东无论是在公共政治领域还是在个人私生活领域都被妖魔化。历史虚无主义者非常清楚，如同全盘否定斯大林导致苏联垮台一样，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崇高地位，只要给他定了“罪”，中国共产党就得为这个“罪”买单。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研究中存在的种种历史虚无主义问题确实具有很大的危害。

第一，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扰乱人们

的视听。人所共知，在东西方文明的发展史上，毛泽东的光辉永远不会暗淡，因为他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极其深刻且长远。毛泽东不但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是一位世界公认的卓越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在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他也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经济战略家。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诗人和书法家。这在古今中外的杰出人物中，都是极为少见的。然而，历史虚无主义在毛泽东研究中要么神化、要么丑化毛泽东形象，极力消除主流意识形态、扰乱人们的视听，存在两个明显倾向：一是把毛泽东神化、偶像化，认为解决当代中国的问题只有依靠毛泽东思想才有希望；二是把毛泽东丑化、妖魔化，认为只有全盘否定毛泽东，中国才能发展。其实，二者本质上都是虚化毛泽东，是“左”、“右”两种倾向的极端表现。实际上，一个民族和国家总是停留在历史温床上故步自封是没有希望的，同样，一个民族和国家总是丑化、



1959年石鲁创作的国画《转战陕北》

矮化甚至虚化自己的领袖人物，这个民族和国家也难以有什么真正内在的自信与自强。

第二，否认阶级分析方法，从根本上动摇社会主义中国的立国之本和治国之路。列宁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划分为阶级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分析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社会历史现象，就是阶级分析的方法，这是唯物史观研究社会历史问题应采用的基本方法，也只有坚持运用这一基本方法，才能揭示隐藏在政治思想斗争背后的、最终起决定作用的阶级的物质利益，抛开了这一基本点就会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淖之中。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往往采取否认阶级分析方法，不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进行科学分析、力戒片面性和绝对化，而是相反，甚至作简单的历史类比和歪曲历史、裁剪历史。早在1956年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之时，毛泽东就敏锐地看到了它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在他看来，这绝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更是涉及如何看待斯大林领导的近30年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问题，如果历史被否定了，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失去存在的理由。后来的事实果然证明了这一点。现在，如果任由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泛滥，也会从根本上动摇社会主义中国的立国之本和强国之路，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第三，迎合西方反共势力“西化”“分化”

“和平演变”中国战略图谋，企图阻挠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发展。“和平演变”战略图谋是国际帝国主义对我国采取武装干涉、军事包围和政治孤立遭到失败之后，以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渗透为主要形式，企图使无产阶级政权从内部演变，从而达到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防止“和平演变”，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

保持政权的问题。在这一国际国内复杂的社会背景下，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与西方反共势力相呼应，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进而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现象时有泛起，值得警惕。例如，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夕，西方媒体着实鼓噪“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且卖力造谣说“十八大上将不会再提毛泽东思想”，围绕这个话题传得很具体，诸如中国共产党的党章要全面修改、毛主席纪念堂要拆掉、党校开设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要停止，等等。一段时间里，这些谣传确确实实不同程度干扰着一些人的思想和认识。对此，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大修订的党章给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谣言以有力回击，也及时教育了思想认识上有所动摇和存在偏差的人们。

三、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的应对

邓小平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当前，面对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所引发的种种危害，我们必须高度关注，下好先手棋，做好热身策，打好主动仗，积极探寻出历史虚无主义的应对措施。

（一）头脑清醒，旗帜鲜明

应当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有着明显的政治诉求和现实指向，即以毛泽东研究为切入点，根本价值预设就是要扰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成就。对此，我们必须头脑清醒、旗帜鲜明、敢于亮剑，看到毛泽东研究中

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性、迫切性，认清这绝不是什么学术观点之争，而是改革开放条件下的一场必须面对的尖锐的意识形态斗争，是关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朝着什么目标前进”等根本性问题上的激烈复杂斗争。这一斗争的结果，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这一点，正如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问题，坚定理想信念。同时，要科学理解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两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内在关系，充分认清我们与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斗争的复杂性、长期性、尖锐性，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忧患意识，经常预判斗争状态，及时有效加以应对。

（二）整合力量，壮大队伍

对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问题，有人旧话重提，称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林彪在其政变纲领中咒骂毛泽东是独裁者，海外出版的书刊中称毛泽东独裁专制、独裁专断、独裁暴政者亦不在少数，现今舆论界也有人因袭这些说法。针对诸如此类的错误言论甚至造谣，必须整合力量，壮大队伍，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予以有力回击。一要组织毛泽东研究大家、专家精心细读、透彻研究毛泽东著作、思想和事件的来龙去脉，有针对性地回应社会大众对历史和史实的关切，通过各种手段把毛泽东研究中被历史虚无主义者颠倒的历史进行正本清源。二要加强力量、加大力度认真梳理和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国近现代史、共和国史、党史军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重要历史人物的言论行为，将其实事求是地呈现出来。使专业学者能

依据档案史实，反驳和抨击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那些歪曲历史的言论，也使一些所谓“野史”“戏说”“新解”“揭秘”等难行其道，警惕和防范蓄意制造和传播谣言的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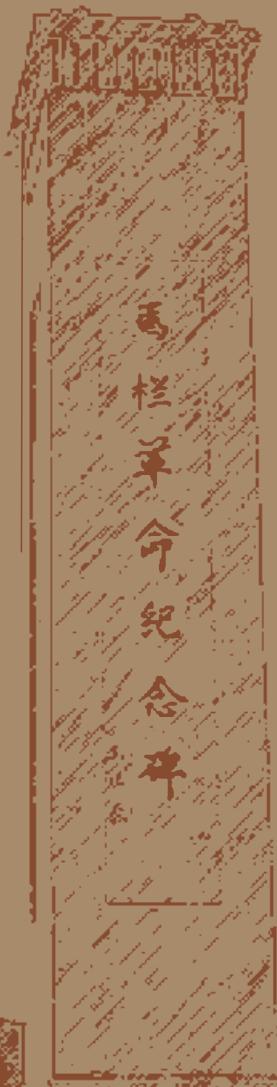
（三）加强沟通，巩固阵地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批驳问题，有人提出要加强交流，从长时段的历史反馈性来审视毛泽东的历史价值，认为毛泽东作为一个改变了20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人物，其影响不会仅仅止于其生存的时代。因而，改革开放时期对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的驳斥，就不能静止于毛泽东时代或后毛泽东时代，而必须放眼中中国和世界当代及未来的发展大势。这种客观冷静的交流和分析态度，我们认为是较为科学的应对举措。

同时，也要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具有一定社会基础，既源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所导致的社会意识领域的变化，也折射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确实仍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进一步予以认真解决，否则就会在客观上助长这一领域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因此，要下更大力气牢牢巩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努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须熟练掌握传统舆论工具，又应善于运用和管控新媒体，把新媒体作为传播正史信史、反驳错误历史言论的新阵地，对于蓄意编造和传播历史谣言的，要及时予以澄清并依法惩处，确保新媒体不为历史虚无主义提供阵地和渠道。而且，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全面深化改革，一心一意搞建设、聚精会神谋发展，积极地创造性地做好当前的各项工作，因为只有在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不断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才是真正铲除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的治本之策。

（作者为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党史教育基地之
DANGSHIJIAOYUDIZHI MALANGEMINGJIUZHI
马栏革命旧址





马栏革命旧址

MALANGEMINGJIUZHI

马栏革命旧址 位于旬邑县马栏镇马栏村，由中共陕西省（工）委、关中分区党政军机关旧址，陕甘宁边区警备第一旅、工字房、七孔石桥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八一剧团、河南省委、山西省委、关中分区粮仓、关中分区医院、关中报社等革命遗存组成。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马栏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活动地区之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马栏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是圣地延安的前沿哨所，是西安乃至全国各地仁人志士和军用物资通往延安的重要驿站和红色通道。中共陕西省委、关中分区机关驻此约8个春秋。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汪锋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在这里生活和战斗过。

马栏革命旧址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全国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马栏革命纪念馆于2011年6月中旬全面布展开放，馆内建筑面积3600平方米，展出图片800余幅，革命文物600多件，借用声、光、电等高科技手段，多角度全方位展示了陕甘宁边区关中特区、关中分区的革命历史，生动地再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2011年，马栏革命纪念馆被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命名为第一批省级党史教育基地。



马栏革命纪念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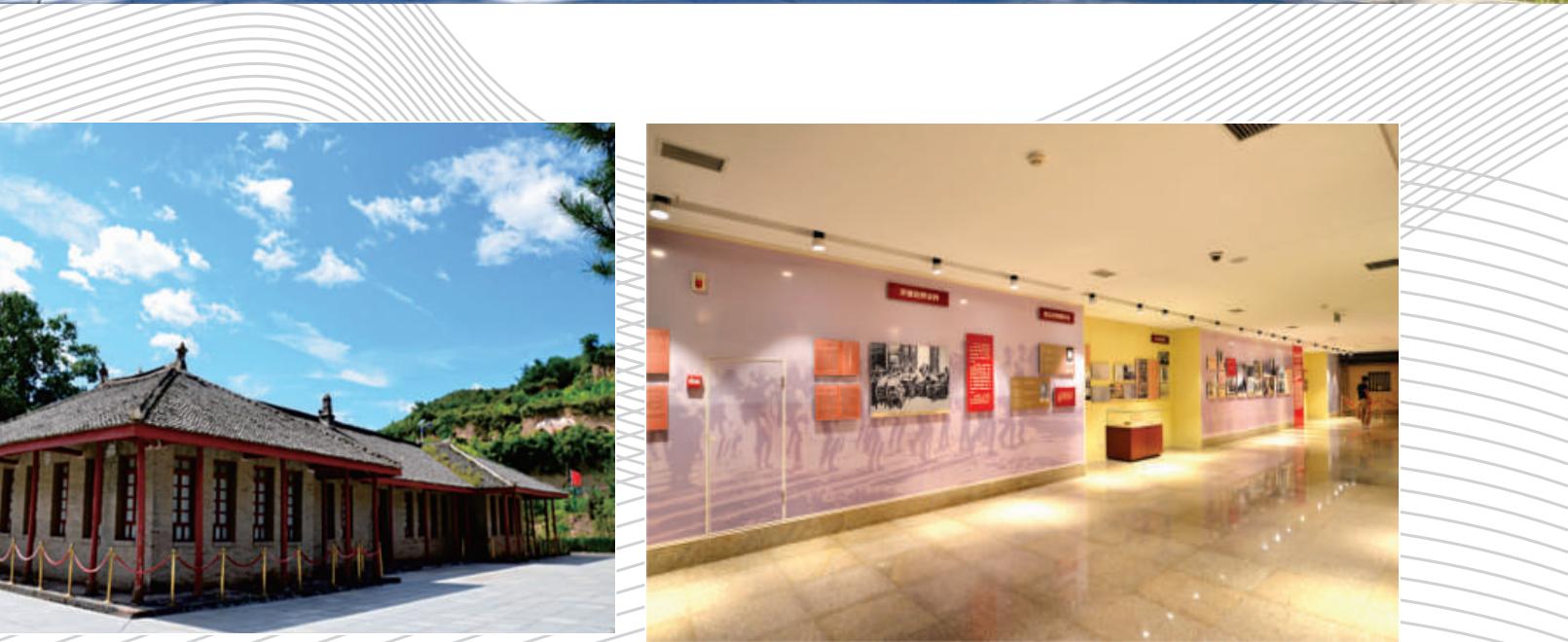


“峥嵘岁月” 青铜雕像





43



工字房

马栏革命纪念馆展陈内容



关中分区党政军机关及中共陕西省委马栏旧址



中共陕西省委、关中地委、关中军分区旧址大门

44



七孔桥

马栏千人大礼堂

□ 中共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马栏革命纪念馆中有一个沙盘模型，形象地展示着马栏作为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首府所在地的情形。工字房和大礼堂作为当年马栏较有名的两座建筑，是关中分区欣欣向荣的见证。工字房旧址现被用来展览军民大生产运动的成果，千人大礼堂虽不复存在，但据曾在关中师范上学的任应斌撰文回忆：这座可容纳千人的大礼堂，尽管屋顶上部没有封闭，门窗没有油漆，完全是一栋土木结构的建筑，但意义却相当重要。

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国共合作，在关中分区大搞反共磨擦，随着反磨擦斗争的持续深入，中共关中分委、中共陕西省委党政军机关先后于1941年年底迁驻旬邑马栏，国民党统治区临潼、渭南、富平、耀县等地的不少群众也迁往马栏定居。

关中分委机关初到马栏时，条件十分简陋，无论是开大会听报告，还是组织军民联欢演戏等活动，都只能在露天旷野举行。每次开会时，习仲勋等领导同志就站在马栏河西岸山脚下的土台子上讲话，与会人员则自带小木凳子或就坐在石块和土地上参会，遇到下雨天会议就只能延期。

1943年，关中分委与陕西省委合并成立关中地委，决定在机关驻地山坡下的一块平地上，修建一座能容纳千人的大礼堂。为加强对修建工作的领导，确保尽快开工修建，地委专门成立了修建指挥部，抽调省委研究室的杨力生和军分区政治部的张建民任正副指挥，全权负责大礼堂的修建工作。大礼堂计划采用砖木石结构，借鉴看花

官的建筑风格，建成后可容纳千余人。

大礼堂的建设得到了驻地干部、战士和群众的大力支持。在地委领导的带领下，大家积极上山采运木料，椽檩砍伐、运输任务主要由关中师范师生承担。学校按照师生员工的班次、年龄大小、身体强弱，分编砍伐组、运输组和后勤组，各司其职。一些身强力壮的同学和警备司令部教导队的同志负责抬运大梁和柱子，女同学在河滩抬沙子、拣石子负责铺设大礼堂外边的人行道路。开采树木的地方在马栏周围的深山，距离马栏最近的地方往返也有十几公里。师生们每天不仅要完成教学任务，还要完成修建大礼堂的砍椽和运送工作，但他们从不喊苦喊累，常常不顾山高坡陡，你追我赶地在冰天雪地里砍伐运送木材，并肩战斗。许多教师和同学因为完成任务出色，学校在最后总结表彰时给他们颁发了毛巾、肥皂或笔记本、钢笔等奖品。

经过近一年的劳动，大礼堂顺利建成并投入使用。1944年春节，驻马栏的机关单位在这里组织了一次群众性的联合演出，方圆百里的群众都来观看节目。不久，边区政府又派电影队在这里放映电影，好多同志都是第一次看电影，第一次从扩音器中听到讲话，大开眼界，增长了不少新知识。此后，千人大礼堂逐渐成为马栏政治、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大举围剿边区，千人大礼堂的主体被战火烧毁了大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大礼堂残留部分因为风吹雨淋，濒临倒塌，后全部拆除。

市县动态

46

咸阳市

第四批党史教育基地授牌仪式在吴运铎纪念馆举行

5月30日，咸阳市第四批党史教育基地授牌仪式在吴运铎纪念馆举行。西北机电工程研究所吴运铎纪念馆、咸阳市第一人民医院院史馆、泾阳县烈士陵园、乾县王炳南生平纪念馆、彬州市权家桥阻击战烈士纪念园5处革命旧址被命名为咸阳市第四批党史教育基地。

授牌仪式上，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蒙强调，党史工作部门和党史工作者，要主动作为，更好地发挥以党史教育基地为代表的革命遗址宣传教育重要作用。揭牌仪式后，大家瞻仰了馆内展出的像章、图片、文物和历史资料，了解了吴运铎投身革命的英勇事迹和勇往直前的奋斗历程，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将革命先辈的崇高品质融入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将革命先辈的伟大精神发扬光大，传承下去。

(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樊亚妮 供稿)

汉中市

汉中市委党史研究室 举办2024年全市党史干部业务培训班

5月20日至22日，汉中市委党史研究室举办2024年全市党史干部业务培训班。市、县（区）党史部门负责人及业务骨干共40余人参加了培训。

培训中，陕西理工大学陈燕教授作《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 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专题讲座；省委党史研究室二级巡视员汤彦宜围绕《如何尽职尽责做好党史作品审读审看工作》就党史题材作品审读审看工作作专题辅导；汉中市委党校讲师雷婷以《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 建功立业新时代》为题，结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作专题讲座。汉中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王燕以《马克思主义在汉中的早期传播》为题，围绕马克思主义在汉中的传播、汉中早期共产党员、中共汉中早期组织等内容进行了专题辅导。汉中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秦小军领学《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读。

(汉中市委党史研究室张磊 供稿)

渭南市

澄城县“党史学习教育进校园”活动走进安里镇

5月31日，在一年一度的“六一”儿童节前夕，澄城县委党史研究室联合县关工委走进安里镇，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进校园”活动。

活动中，澄城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郭西峰以《“红色澄城”炼成记——革命老区澄城县红色印迹》为题，讲述了澄合战役、中共第一野战军前委第六次扩大会议等重大党史事件，回顾了解放大西北的光辉历程。并向安里镇基层关工委、安里镇学校赠送了《中国共产党陕西省澄城县历史（1949—1978）》《中国共产党澄城县历史大事记（1921—2021）》等党史著作20余套，并联合县关工委给受资助的10名学生发放了学习用品。这次“党史进校园”活动，是贯彻落实《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的一项有效举措。同学们纷纷表示，要珍惜当下的美好幸福生活，好好学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澄城县委党史研究室芦飞飞 供稿)

商洛市

丹凤县委党史研究县志办公室开展 “筑梦新时代·对话二十年后的自己”暨 党史“七进”主题活动

5月21日，丹凤县委党史研究县志办公室联合县档案馆、团县委、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丹凤县第二小学开展“筑梦新时代·对话二十年后的自己”暨党史“七进”主题活动。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丹凤县第二小学300余名师生参加活动。

活动中，丹凤县委史志办干部为大家讲述了丹凤革命斗争史，并为学校赠送了《中共丹凤历史》第二卷、《红色留仙坪》《丹凤县志（1991—2010）》《丹凤年鉴》（2019卷—2023卷）等书籍。学生们将《给二十年后的自己写的一封信》交给县档案馆。同学们纷纷表示要努力争当新时代好少年，为建设家乡贡献一份力量。下一步，丹凤县委史志办将深入贯彻落实《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不断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积极做好史志育人工作。

(丹凤县委党史研究室王林 供稿)

宣教动态

1.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开通“百年辉煌”新媒体账号、《红相册》系列微纪录片即时上线。4月29日下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举行“百年辉煌”新媒体开通暨“红相册”系列微纪录片上线仪式。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董昕等出席并讲话，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王全春主持仪式。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广电总局及有关媒体单位、新媒体平台的代表参加活动。为进一步拓展新媒体传播渠道，打造更具影响力的新媒体平台，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主管的《百年潮》杂志注册的“百年辉煌”抖音号、今日头条号、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等系列新媒体账号，于即日开通运行，今后还将在其他新媒体平台陆续开通账号。新开通的“百年辉煌”将和原有的“黄城根下”“党的历史”“党的文献”“党史网”等新媒体账号一起，构成一个更为完善的党史新媒体传播矩阵。系列账号坚持“党史宣传教育的引领者、权威正史内容的提供者、伟大建党精神的弘扬者、正确党史观的塑造者”的定位，依托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丰富的编研成果资源和专家人才资源，积极利用图文和短视频等新媒体手段开展通俗化党史内容传播，努力打造具有鲜明政治性、专业性、权威性、开放性的党史类新媒体传播高端平台。

2. 四川省启动“青年学党史·奋进新征程”大学生有声阅读党史作品展播活动。5月8日，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委教育工委、团省委主办，西南石油大学、四川传媒学院承办的四川省“青年学党史·奋进新征程”大学生有声阅读党史作品展播活动正式启动。省委党史研究室等活动主办方选取了王右木、江

竹筠、邓稼先、兰辉等22位四川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事迹，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传播、红军飞夺泸定桥、巴山来了共产党等23件发生在四川的重大党史事件作为有声阅读文本，印发给全省普通高校，由各高校组织学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录制有声阅读音频作品。通过阅读党史作品、讲述党史故事，明理增信、崇德力行，展现新时代大学生蓬勃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青春力量。按照活动要求，即日起由各高校组织大学生开展读党史活动，遴选优秀作品参加展播。主办方将组织党史专家、高校思政课教师等，对征集的有声阅读作品进行评选，选取优秀作品在合作媒体平台进行线上展播。

3. 北京市东城区委党史办“红色记忆”党史宣讲团正式成立。为更好地贯彻《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充分发挥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功能，北京市东城区委党史办研究决定正式成立党史办“红色记忆”党史宣讲团。成立仪式于2024年5月8日下午在原北京大学二院举办。党史办全体党员干部、驻区委组织部派驻纪检组、“伟大开篇”展览馆宣讲团成员、东四街道总院社区党员参加会议。会上，党史办主任丁选云宣读了《关于成立东城区委党史办“红色记忆”党史宣讲团的决定》，并为宣讲团授旗。随后，宣讲团首任团长胡澄以“北大二院的红色记忆”为题，为与会党员干部讲授党课。宣讲从北京大学创办谈起，讲述了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等革命先烈在北大二院从事革命活动的光辉足迹和感人事迹，发人深省、令人鼓舞、催人奋进。会后，在宣讲团带领下，大家共同参观了“伟大开篇”专题展。

科研动态

48

1. 党史基本著作编写工作培训班在上海举办。
4月22日至28日，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落实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个五年工作规划，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史基本著作编写工作高质量发展，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在上海举办党史基本著作编写工作培训班。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以视频形式作《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宣讲报告，副院长季正聚作专题报告。全国各省级、副省级党史和文献部门分管编研业务的负责同志，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相关负责同志，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部分新任职处级干部，上海市、区两级党史部门编研业务骨干，共计100余人参加培训。围绕培训主题，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主任刘荣刚在开班式上传达了曲青山院长关于地方党史三卷、四卷编写工作的指导意见。此外，培训班设置“《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学习贯彻情况”和“党史基本著作编写经验和培训体会”2次分组研讨，并组织学员到中共一大会址和纪念馆、陆家嘴金融城党群服务中心等地开展现场教学。

2. 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彪炳史册 光耀千秋——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入选2024年第一季度“辽宁好书”。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彪炳史册 光耀千秋——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成功入选由辽宁省全民读书节组委会办公室、辽宁省新闻出版局组织评选的2024年第一季度“辽宁好书”榜单。2021年9月，党中央正式发布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第一批伟大精神，东北抗联精神位列其中。2022年6月，党中央确定了东北抗联精神的基本内涵。为了深入阐释东北抗联精神的基本内涵和时代价值，辽宁

省委党史研究室精心筹划，积极部署，抽调骨干力量历时一年完成《彪炳史册 光耀千秋——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的编写，并于2024年1月正式出版。全书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原则，遵循党的三个历史决议，通过史论结合、图文并茂的方式，从东北抗联精神的形成过程、丰富内涵、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四个维度进行了论述，生动再现了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书写的可歌可泣壮丽篇章。作为系统阐释东北抗联精神基本内涵的专门著作，该书的出版对于继承和弘扬东北抗联精神，推动东北抗联精神研究走深走实具有重要意义。

3.《我的1949：武汉解放口述史（一）》出版发行。5月15日，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在武汉会议中心江汉厅举办《我的1949：武汉解放口述史（一）》新书首发会暨赠书仪式。会议现场，该书主策划，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王怀卓对本书作介绍。该书是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及武汉解放75周年献礼之作，所录文章均为解放战争时期参与武汉解放亲历者的个人回忆，生动再现了1946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武汉地区地下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江城迎来解放的历史片段。亲历者们从不同的社会身份和视角，讲述了自己当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汉地区地下斗争和迎接解放的经历，从多角度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国统区地下斗争的正确策略和耐心细致开展的各项工作，以及武汉地区人民群众对光明前途的憧憬向往。本书作为武汉地方党史正本的有益补充，内容翔实、情节鲜活、可读性强，能够帮助广大读者从第一人称视角追忆当年江城解放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同时对于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传承弘扬英雄城市光荣革命传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具有重要意义。